

□ 张建伟

经济理论中的制度分析：在批判中超越

一、批判中的建构

在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家选择制度分析方法不仅仅是源于其对经济现实的关注与洞察,同时也基于其对既有的正统经济学范式的不满与批判。他们在批判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经济学说史上不容忽视的制度分析学派,制度分析在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家那里有不同的理论视角。

马克思不满于庸俗经济学家在制度给定下的辩护性论述,对他们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作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从15世纪开始,人文科学的发展就被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垄断着,不是把它们看作运动的东西,而是看成静止的东西;不是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作活的东西,而是看作死的东西。”(马克思,中文版,1972,第60—62页)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观为方法论基础将制度看成是内生于经济社会系统的变量,力图透过私有制商品经济表层的物与物的关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强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产权制度与新技术之间的不适应性”(诺斯语)。正是这种技术和制度之间的不对称发展,引起技术变革和阶级斗争,推动制度变迁的长期演进。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如历史长镜头一般的长期制度变迁轨迹的描述,以及层层递进的制度变量之间的本质关联模型——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包括产权在内有关制度变量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在他的制度变迁模型中,也隐含着变迁的制度费用的比较,最终表现为是否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程恩富,1997)。贯穿马克思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系统分析的整体观,这使他在经济思想史中独树一帜,很多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家都从他那里汲取营养。

和马克思理论的命运一样,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也被正统经济学家们斥为异端。他们不象新古典学派那样强调经济理性、均衡和最优,也不迷信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魔力,而对组织结构、权力和信仰体系及法律制度保持浓厚兴趣,因此他们可以不依靠假定而对真实世界保持清醒的洞察,并可以用不无讥讽的杂文式笔法尽情抒写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愤懑情绪。从他们的整体主义和演进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可以看到他们脱胎于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胎记。凡勃伦的后继者,近代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加尔布雷斯追随凡勃伦的研究路线,关注经济分析中的权力结构问题,不过他已将其理论嫁接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文本上(Warren, J. Samuels, 中文版,1992),同时他又不满意于只破不立的局面,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济学术语,力图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却终因结构松散而遭致弗里德曼等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和嘲

讽。所幸的是,他的观点却在美国普通大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家理论模型的封闭性、非现实性、形式主义以及稳定性偏好、完全理性等假定颇有微词。他们指出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至少已经忽视了三个研究领域(思拉恩·埃格特森,中文版,1996):

1. 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产权)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运行、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
2. 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
3. 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将产权约束和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不过为了能够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是作了一些妥协和让步,他们采用的是“新古典主义+交易费用”的折衷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并在他们的理论中尝试了数量分析方法,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论点终于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教科书,得以在学生中广泛传播,其对未来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很可能超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想象。

纵观制度经济理论的发展史,无论是马克思的制度经济理论、旧制度学派、近代制度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无不是在批判流行的正统理论过程中尝试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制度分析在他们的手中不仅仅是刺向正统理论的投枪,也是剖析经济弊端、透视经济本质的手术刀。虽然他们观察经济现象的视角不同,理论形态也各异,但他们至少在以下领域能够达成共识:①动态、演进的社会发展观;②系统、有机的整体分析;③关于人的假定不是单一同质的“经济人”假设;④对真实经济世界的关注和对经济本质的洞察;⑤规范分析中包含有较明显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又有各自的缺陷。马克思虽然长于对制度变迁的长期分析但对具体细节却有所遗漏;旧制度主义和近代制度学派虽然注意到社会习俗、文化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作了近似经济社会学的考察和描述,但由于缺乏统一严谨的逻辑结构,被科斯讥刺为“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Coase, 1990)。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理论的严谨性、逻辑的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但在实证检验方面却困难重重(尤其是对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同时也缺少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及旧制度经济学的对人文精神的关注。由此可见,未来的制度经济学发展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要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获得真正的涅槃,还需要经济学家作艰难的探索。这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①未来制度经济学家能否对既存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一次彻底的整理和综合,并超越既有分析范式,各取所长,优势互补;②制度经济学家能否以开放的心态从相关的理论领域中借鉴诸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实证方法等分析工具丰富自己理论分析的工具箱;③制度经济学家能否从历史和现实(如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的事实)中挖掘典型案例来充实其理论模型,并强化其建构理论体系所需基本概念的直觉。从制度经济学的最近发展来看,它已经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

二、理论建构中的超越

制度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制度分析成为剖析现代社会经济问题的有力工具。而新的分析工具的引入以及它与其他经济理论的嫁接与融合使制度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崭新的发展机遇。

1. 博弈论的引入。当代产权理论家Y·巴泽尔在产权分析时已经具有了博弈论的眼光。巴

泽尔在其《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博弈”概念,但其案例分析中充满着博弈论描述。因此此书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汪丁丁,1997)。而产权界定的博弈分析的发展势必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具有相通之处,二者如能相互借鉴与吸收则可避免新制度经济学长期分析方面的不足。

2. 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管理科学、行学科学等理论相互交叉与融合形成组织经济学,其研究领域更加具体而微,而且更加注重应用分析,这种分析方法被莱宾斯坦称为是“微观之微观的分析方法”。组织经济学对组织结构和内部权力的分配等都有十分精到的论述,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应用,使制度经济理论根植于更为现实的土壤之上,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3. 跳出效率导向的单方面论述,关注分配的公平及深层制度结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W·布罗姆利(中文版,1996)不满意于科斯、德姆塞茨、波斯纳等人的私有产权观以及速水和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他认为他们的论点是基于“效率”目标的“同义反复”,判断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否取决于深层制度结构——产权、经济主体财富状况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他更关心利益矛盾和市场效率之后的动态收入分配问题,因此更接近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但却弥补了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细节性遗漏之不足。

4. 通过计算机将混沌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引入制度经济学,提高了制度主义建模的精确性。在这方面主要是迈克尔·J·拉齐斯基的工作,他认为将系统动力学计算机模拟建模(Computer Simulation modeling)引入制度分析,注入数学的严密性,有助于拓展现行的制度理论(M. J. Radzicki,1990)。他的制度动力学模型对制度变迁中的非线性、混沌、蝴蝶效应等均有引人入胜的阐释,并可以通过在其活性结构中内生地引起变化来模拟现实经济社会系统的演进行为,它的发展势必为经济学家探究经济系统的“复杂现象”提供有力的制度分析的技术手段。

5. 转轨国家制度变迁实践提供了有关制度分析的丰富素材,这些国家可以作为制度经济理论效力检测的实验田,并从而催生一些转轨经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国的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已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案例作了搜集整理和分析,一批专门从事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家脱颖而出,很有可能形成制度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制度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笼统的说法,与其把制度分析看作一种分析工具,不如将它看成一种经济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通过这个视角,各个制度经济学家想证明的无非是,制度是起作用的——我们既是制度的产物又是制度的创设者,对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揭示其起源、演进、功能等问题才是经济学家的正着。当然,对制度的分析,不同的经济学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成本收益法、边际分析法、博弈方法、阶级分析法、历史方法、案例法、计算机模拟实证法等等。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必须关注人的主体性,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作为最终旨归,因为制度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人”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因此只有在此基础上的综合与超越才能显示其永恒的理论价值和思想魅力。未来的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的也正是这种在此基础上的综合与超越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 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2. [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8月版。
3. [美]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4. [英]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5. 汤敏·茅于軾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6. [冰]思拉恩·埃格特林:《新制度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 [美]科斯:《关于制度经济学》,载《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9.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0. Radzicki, M. J., "Institutional Dynamics, Deterministic Chaos, and Self-organizing Systems", JEI, March 1990.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邮编:200083)

· 简讯 ·

我校加紧中国实证经济学研究

中国实证经济学研究,是我校“211工程”和全国理论经济学基地建设的重点资助项目之一。我校“中国实证经济学课题组”于去年9月成立以后,已经举办了两次学术研讨会。在9月下旬的第一次研讨会上,经济系教授朱保华作了题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报告。报告介绍了以内生化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并通过经济增长模型本身所决定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来说明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途径的研究情况;同时还就和经济增长理论相关的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人力资本投资的市场失灵、技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与外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表了个人的见解。报告还就利用计量经济方法、研究趋同假说说明各国的长期

经济增长的差异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问题作了介绍。此外,报告还对混沌理论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应用可能性问题作了分析。

在10月份的第二次研讨会上,经济系教授胡景北作了题为“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模式:从理想到科学”的报告,认为目前国内对我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实际上可以视为对改革后中国可能出现的经济模式的研究,指出这种研究还应当包括对改革结果的研究,应当重视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对改革结果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着的若干基本现象,这些现象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不会出现根本的改变,同时又对改革的结果起着基本的作用,例如生产力水平低、失业、中国农业的社会结构等。